特　稿

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军事仗

■王　冬　孙洪伟

阅读提示　**习主席指出，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进入新时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加速演变、深刻重塑。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这些变化，借鉴长征中政治军事仗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把握其整体趋势和本质特征，有助于增强军事斗争准备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打好当今时代的政治军事仗。**

毛泽东同志把政治因素特别突出的作战称为“政治军事仗”。从政治军事仗的视角看，长征胜利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战略突围，更是政治统领军事的伟大胜利，是一部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势的壮丽史诗。长征中的政治军事仗，为新时代推进政治建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

以政治定向，在战略全局中把准前进方向

政治军事仗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战略方向由什么统领、朝什么目标推进。长征的伟大实践和胜利给出了明确答案——政略决定战略，政治全局统领军事大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长征的战略主动权，从来不是局限于战场一时一地的局部主动，而是着眼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全局主动。

长征是在生死存亡绝境中不断校准政治航向的伟大远征。长征初期湘江一战，使红军陷入“往哪里走、怎么走”的迷茫困境。聂荣臻同志回忆：这“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我们党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红军重新找准前进方向。长征途中，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群众大会上宣讲北上抗日，到两河口会议确立“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到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同张国焘南下主张坚决斗争，再到榜罗镇会议确定长征落脚陕北，每一步军事行动方向都紧密服从服务于北上抗日的政治全局。正是因为党中央牢牢把握这一政治方向，把长征前进大方向与抗日救国的民族使命紧紧绑定，变被动突围的孤军为北上抗日的先锋，变军事被动为政治主动，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向抗日前线的战略转移，把长征走成一条通往民族解放的胜利之路。

红军长征用鲜血印证了“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硬不打自垮”的内在规律。军事上的被动，根子往往出在政治方向上的偏差。新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政治建军特有优势，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政治根基，确保强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强军制胜优势。

以政治谋局，在机动周旋中开辟战略通道

如果政治定向定的是政略对战略的统摄，解决“往哪走”的问题，那么政治谋局谋的则是如何以军事手段为政治目标开辟道路，解决“如何走”的问题。这是政治军事仗区别于单纯军事观点的关键，即军事行动谋篇布局始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实现。

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就是这一逻辑的生动演绎。在敌人重兵围堵缝隙中，毛泽东同志以政治为“的”、以军事机动为“矢”，靠政治定力引领战术突围，赢得战略主动。一渡赤水，避敌锋芒；二渡赤水，回师歼敌；三渡赤水，诱敌西向；四渡赤水，战略突围，红军彻底甩开国民党40多万大军围追堵截。从政治军事仗视角看，四渡赤水决策逻辑体现出一个根本原则：军事上的灵活性服从服务于政治上的坚定性。看似迂回折返四次渡河，每一步都服从于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以军事上的机动创造战略转移条件，为长征寻找出路。苟坝会议也是政治谋局的一个典型范例。1935年3月10日，苟坝会议上多数与会者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到周恩来住处详陈利害。次日早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最终决定取消原定攻打计划。后来获取的情报证实，红军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险仗。回望苟坝会议，其意义远超作战决策本身。它推动全党反思，在极端不确定战场环境中军事决策应遵循什么逻辑。攻打打鼓新场，一旦不能速胜，势必陷入攻坚战。然而红军当时最紧迫任务不是打一仗、夺一城，而是“应当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保存革命火种，完成北上抗日战略转移。

透过历史，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治谋局本质上是着眼政治目标运筹军事行动。打还是不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新征程上，要锚定政治建军这个立军之本，把提高官兵政治素养、锤炼政治本领贯穿战建备各领域全过程，在重大任务考验中练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以政治凝心，在生死考验中淬炼思想意志

政治军事仗，不仅是政治统领军事，更是以政治之力催生军事伟力。长征途中，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物资极度匮乏、前路险象环生环境下，面对重兵围堵、饥寒交迫、雪山草地等极限考验，究竟凭借何种力量实现绝境重生，完成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远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使红军催生出拖不垮、打不烂的强大战斗力。

越是生死绝境，越见“生命线”伟力。探寻这种力量之源，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其一，思想铸魂。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与统一的思想。遵义会议后，面对教条主义思想余毒和官兵困惑，党中央把统一思想、凝聚意志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通过电报、会议等形式迅速把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全军，把红军的信念、意志、步调拧成一股绳，为实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军事行动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其二，组织强基。红军屡遭绝境而不瓦解、不溃散的另一根本保证是“支部建在连上”。建制可以打散，支部不会散。长征途中，各级干部伤亡率极高，人员打散、队伍失联是常态，但只要党组织在、党员骨干在，队伍就有主心骨、有方向、有力量，就会再次凝聚起来。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副连长李玉胜收拢全团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走出草地，最终闯过生死关，回到党中央身边。其三，情感聚力。红军队伍中有一种旧军队不可能拥有的新型内部关系——官兵一致。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李伯钊曾动情回忆：“士兵爱士兵，士兵爱官长，官长爱士兵”“全军完全在政治思想上，活泼精神中，纯真的同志关系中，融为一体”。这种融成一体的关系，体现在长征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平时同甘苦，战时方能共生死，这种平等民主的内部关系迸发出的战斗力，是敌人永远无法复制的政治优势。

长征路上，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检验了这条真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新征程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犹存，必须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掌握部队，不断赋予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新的时代内涵，持续凝聚强军兴军磅礴力量。

以政治塑势，在汇聚合力中创造有利条件

政治军事仗区别于单纯军事仗的又一关键，在于通过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塑造有利的战场环境、力量格局和行动条件，最终形成统摄全局的强大政治势能。回望长征，它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塑势，是扩大党和红军影响、宣传革命主张、动员革命群众、吹响民族觉醒和奋进号角的政治征程。

长征途中，红军不仅面对军事围剿，更面对复杂地域、复杂民族、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这期间，党和红军成功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代表等的统战工作。例如，长征前夕，利用粤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达成“五项协议”，为初期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长征中，面对沿途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误导等情况，红军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主动帮群众挑水、种地、打扫院子，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用实际行动让群众认识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同时，注重做好对沿途群众的发动，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革命热情。长征途中，仅给红军带路的向导就有近3000人，参与筹粮、掩护伤员、传递情报的群众数不胜数，沿途更有数万名群众加入红军。党创造性地制定并宣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改变了少数民族对红军、对革命的认知，留下“单家集夜话”“彝海结盟”等佳话，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

长征的实践表明，真正的战场优势，从来不只是兵力和火力的对比，更是政治根基、人心向背的较量。新征程上，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政治本色转化为制胜优势，把民族团结优势转化为边防稳固支撑，把政治根基转化为官兵敢打必胜、群众全力支持的打赢底气，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保障先行　决胜千里

——从漠北之战看多域作战后装保障

■魏裔军　陈永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漠北之战是古代远程作战保障的经典战例，表面上此战是战斗力比拼，深层次则是保障力的较量。其蕴含的制胜逻辑，与现代后装保障“预置先行、体系强韧、精准高效”的要求一脉相承，对构建新时代多域作战后装保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公元前119年，汉军穿越千里大漠深入匈奴腹地，面临补给线漫长、道路稀少、无固定补给据点等严峻考验。匈奴以逸待劳，企图通过消耗汉军补给将其拖垮。汉军综合运用战略预置、分段接力、因地配力、以战养战等保障手段，推动保障力与战斗力深度耦合，最终取得战略胜利，封狼居胥。

战略预置：以先行保障把握作战主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打赢战争，汉武帝历时数年统筹全国人力物力，测算十万骑兵的粮食、饮水、军械消耗和十四万匹官私马匹的草料需求，在朔方、五原等边境要地经营屯田、转运粮秣，同时动员数十万步兵、民夫组成预设转运梯队，将保障准备提前至战争发起之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此战出征时“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大规模战前预置为汉军远征提供了基本物质支撑，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深入漠北则粮尽兵疲”的作战困境。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将保障从“作战伴随”升级为“战略先行”，以时间上的提前量换取空间上的主动权。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阶段，“预置”的内涵已从单纯物资囤积拓展为能力前置、布局前移。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精准研判各作战域消耗规律，在关键方向、核心节点分类预置装备维修模块、弹药器材单元、应急保障方舱；优化战略物资与装备储备布局，推动海上预置力量、岸基维修基地、信息域技术节点同步前置，实现“仗在哪里打、保障就在哪里布势”，牢牢掌握多域后装保障主动权。

分段接力：以分布式保障增强体系韧性。千里馈粮，道远且险。古时长途运粮有“十余钟致一石”之说，足见途中损耗之巨，而单一补给线更易被敌方切断。漠北之战中，汉军改变长途单线转运模式，依托后方基地和沿途节点，采取分段接力方式向前线输送粮草辎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此战“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即数十万转运人员随军跟进、接力输送，沿途设置临时补给节点，各段衔接、互为支撑。分段转运既显著降低了物资途耗，也降低了补给线被单点切断的风险。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变线性保障为分布式保障，分散整体风险，以多点备份提升体系抗毁韧性。如今多域作战中保障链路跨域延伸、节点数量剧增，传统单域单线保障模式抗干扰能力弱，某一域补给中断极易传导波及全域。要打破传统线性保障格局，构建“后方智能仓储—无人中继节点—前沿机动方舱”三级分布式补给网络，同步建立装备器材跨域转投机制、分级抢修流程。依托物联网实现各域节点互联互通、智能调度，打通后方基地、区域枢纽、前沿保障点的三级接力链路，形成多路径、多方向补给格局，打造韧性强劲的多域协同后装保障体系。

因地配力：以精准适配释放保障效能。不同战场环境，需要不同的保障力量配置。针对沙漠地形复杂、车马通行困难等情况，汉军调集骆驼等适应戈壁环境的运力承担运输任务。同时，汉军还征集了大量“私马”，即官兵自带的随军驮马。“私马”主要用于驮运随身衣物、装具等物资，既补充了运力，又可减少战马损耗。这种因地制宜的运力调配，使各类保障力量精准适配战场环境，有效提升了保障效能。这种保障方式效能释放的关键，是以保障模式的多样性应对战场环境的差异性，精准施策、务求实效。今天，多域作战覆盖陆、海、空、天、网、电等多个领域，各域装备类型、任务场景、保障需求差异显著，通用化保障模式难以适配全域。要坚持“一域一策、分类保障”，陆上方向部署机动维修方舱群，海上方向配属伴随保障编队，电磁、网络域强化远程技术支援力量；大力发展无人投送、两栖补给等新型保障装备和手段，推行物资装载标准化、单元化，提升跨域投送快速转换与综合运用能力，形成稳固的多域后装保障链路。

以战养战：以资源拓展突破保障边界。深入无依托地域作战，单纯依赖后方输送难以为继。霍去病所部减少重型辎重，轻骑突进，打击匈奴后方补给，将缴获的牲畜、粮食直接用于部队补给。汉武帝诏书载其“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这种源自《孙子兵法·作战篇》“因粮于敌”思想的保障模式，既减轻了后方补给压力，又保住了部队机动优势，是远征作战的重要制胜手段。这一保障方式的深层逻辑，是摆脱对后方补给的路径依赖，将战场资源转化为保障能力，实现从“被动等供”向“主动取给”转变。如今多域作战中若完全依靠后方统一投送，不仅链路长、时效慢，也容易造成各域内资源闲置浪费。要活用“以战养战”智慧，依托智能化感知手段，快速探测评估战场内油料、水源、装备器材及民用设施等可用资源；健全战场资源转化机制，推行域内装备就地抢修、通用器材就地筹措、民用设施就地征用，规范战场资源调用流程，持续提升无依托条件下的自主保障能力。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从漠北之战的千里馈粮到现代战争的全域保障，今天要做好后装保障，既要汲取经典战例中的先哲智慧，也要紧贴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推动后装保障向精准配送、智能调度、全域支撑转型，加快构建与跨域作战相适应的现代后装体系，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支撑。

观点争鸣

善于向“柔性指挥”要战斗力

■世家定　赵　林

●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对作战指挥方式创新提出迫切要求。在坚持集中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必须通过系统提升指挥机构弹性、作战编组灵活性和指挥流程敏捷性，并依托跨域协同、动态授权、抗毁恢复等机制规范运行，全面提升柔性指挥能力。

当前，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演进。近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表明，传统层级繁多、流程固化、编组固定的刚性指挥模式，难以适应智能化作战指挥的敏捷性、灵活性要求，亟需创新指挥方式。在坚持集中统一指挥根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增加“柔性”要素，实施统分结合、刚柔相济的柔性指挥，是应对瞬息万变智能化战场的必然选择。

深刻把握柔性指挥的内在逻辑

柔性指挥，是为顺应战争智能化演进规律、弥补刚性指挥短板，在坚持集中统一指挥根本原则下，通过适度下放指挥决策权限、构建分布式弹性指挥机构、推行模块化动态作战编组、打造自适应敏捷指挥流程，从而提升指挥响应速度与战场适应能力，有效应对战争不确定性的新型指挥方式。其内在逻辑体现为三个方面：

顺应战争形态演进大势。战争形态决定指挥方式。冷兵器战争战线固定、节奏缓慢，集中指挥即可满足需求。机械化战争以线式攻防为主，层级固定、流程固化的刚性指挥亦能胜任。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侦察感知全域覆盖、远程火力精确打击、网络电磁攻防激烈，大型固定指挥中枢生存堪忧，极易在开战之初遭敌精准摧毁。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有关各方多主动摒弃大型固定指挥所，转而采用机动分散的小型指挥机构。构建分布式小型指挥机构，科学下放指挥权限，实施柔性指挥，是顺应智能化战争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弥补刚性指挥固有短板。传统刚性指挥，存在机构固定易毁、编组僵化难调、流程繁琐迟缓等弊端。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沿用刚性指挥的一方，因指挥所位置暴露、指挥链路冗长、前线临机处置权缺失，导致指挥节点频遭打击，且官兵发现目标后需层层请示，常痛失战机。反观对手，依托便携指挥终端压缩层级，实现侦察力量与火力单元直接对接，快速完成杀伤链闭合。战争实践表明，刚性指挥的固有短板已成为制胜瓶颈，必须通过柔性指挥加以有效弥补。

实现刚柔优势互补共生。刚性指挥与柔性指挥并非对立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刚性管总，重在定方向、控大局。战略部署、重大行动必须坚持刚性的集中统一指挥，确保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柔性应变，重在抓战机、活战术。面对战场突发情况、稍纵即逝的战机、局部态势变化，需敢于科学授权，允许一线指挥员灵活处置、快速反应。因此，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坚持刚性为根基、柔性为补充，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指挥效能最大化。

着力提升柔性指挥的核心能力

提升柔性指挥能力是实施柔性指挥的基础。需围绕指挥机构、作战编组、指挥流程三个关键维度协同发力，依托智能技术赋能，系统构建能力体系。

构建分布式弹性指挥机构。打破传统的指挥架构，构建分布式、可机动、可无缝接替的弹性指挥体系。将大型固定指挥中心拆解为多个小型化、便携化、高隐蔽、强机动的指挥单元，分散部署于战场全域，依托军用通信链路和战场云平台实现高效互联、功能聚合，形成“形散神聚”的有机整体，显著提升战场生存能力。近几场局部战争已充分验证这一判断，各方广泛运用车载、单兵便携及小型指挥终端实施分散部署，即使部分单元受损，整体指挥体系仍能稳定运行。

推行模块化动态作战编组。提升指挥柔性的关键在于打破编制束缚，实现作战力量“按需抽组、灵活搭配、即用即联、任务归建”。应依据侦察预警、火力打击、电子对抗、无人作战等核心功能，打造标准化、通用化作战模块。战时根据敌情、地形、任务需求，快速组合模块，形成最优任务单元。外军在多场冲突中，凭借模块化编组，实现了打击模式快速切换、作战重心灵活调整、精确适配各类目标，展现出较强的战场适应力。

打造自适应敏捷指挥流程。智能化战场决策窗口期急剧压缩，必须精简优化指挥流程。关键在于明晰权责边界，实施分级授权决策。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自动化完成情报筛选、态势研判，减少人工重复劳动。同时，严格区分决策层级，战略战役级重大行动，坚持高层集中指挥；对于前线突发敌情、动态高价值目标等，全面下放临机处置权，确保一线指挥员能够快速决策。近几场局部战争中，实力较弱一方凭借扁平化指挥链路和快速决策机制抢占先机、掌握主动的战例，有力印证了精简流程、快速决断的极端重要性。

健全规范柔性指挥的运行机制

柔性指挥并非随意无序，灵活必须建立在规范之上。确保柔性指挥落地见效、规范运行，必须依托配套机制，做到“灵活有边界、放权有底线”，实现部队“放而不乱”。

健全跨域协同机制。力量分散部署后，信息阻隔、协同不畅易导致各自为战。所以，要统一数据标准与通信协议，确保所有作战单元共享统一、实时的战场态势图；要建立智能自主协同机制，使分散的指挥单元能依托智能平台主动感知态势、智能补位协同，减少不必要的上报协调环节，实现不同作战力量优势互补、效能倍增。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有的军队在战争初期因协同不畅陷入被动，而后期则通过健全机制使体系效能显著提升，这些经验教训从正反两面印证了顺畅协同机制是分散力量“攥指成拳”、形成体系合力的关键。

推行动态授权机制。固定权限难以适应动态战场。需建立随战场态势实时调整的分级授权机制：态势平稳时，适度收紧权限，规范一线行动；当遭遇敌情突发、节点受损、有利战机闪现等情况时，系统应能自动快速下放相应临机处置权限；态势平稳后及时回收权限。同时，必须细化各级权责清单，清晰界定自主处置与必须上报的权限边界，做到“放权不放任”，充分激发各级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释放作战潜能。

完善抗毁恢复机制。现代战争首打指挥节点，必须构建多层次冗余备份手段以保障指挥稳定连续。在通信上要构建立体化多重通信链路，实现断链自动切换。在指挥上要预先制定周密的权限移交、任务转接预案和流程，确保节点受损后指挥权能无缝、顺畅交接。在装备保障上要编组机动抢修分队前出部署，确保受损指挥装备能快速修复。近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表明，完善的备份链路与节点替补方案，是保障指挥体系在持续火力打击下保持韧性的基石。

总之，唯有坚持刚性管总、柔性应变、刚柔相济的原则，实现两种指挥方式的优势互补，才能更有效地驾驭智能化战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掌握未来战场主动权。